

■ 教育与经济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5.01.006

共同富裕目标下高等教育获得 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



万洋,李锋亮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

摘要:通过慈善事业优化收入分配,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议题之一。作为社会进步的基石,高等教育不仅为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机会,也在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采用高校扩招提供的准实验设计,识别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1)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体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引入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仍旧成立;(2)高等教育获得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机制从收入水平、数字能力和社会信任3个维度得到证明,个体的收入水平为捐赠提供了经济基础,数字能力拓展了捐赠渠道,社会信任增强了捐赠意愿,这些机制综合作用于高学历群体,使其在慈善领域呈现更大的活跃度和贡献度;(3)高等教育获得对慈善捐赠行为的促进效应在分性别与早期户口的子样本中均较为显著,该效应在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拥有农村出身与成长经历的群体中更为突出。基于上述发现,建议协同推进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容,针对弱势群体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格局和资助政策体系,并在人才培养中强化道德教育和慈善教育,以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共同富裕建设的赋能作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获得;慈善捐赠行为;共同富裕;高校扩招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5)01005812

修回日期:202412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背景下的教育质量评价研究”(22JJD880002)

作者简介:万洋,男,河南信阳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通信作者:李锋亮,男,江西萍乡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与研究生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万洋,李锋亮.共同富裕目标下高等教育获得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1):5869.

Citation format:WAN Yang, LI Fengliang.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on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5,13(1):5869.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释了分配制度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核心地位。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的内涵不仅仅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财富水平的追求上，更在于推动财富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均衡分配，从而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因此，在共同富裕宏伟蓝图的指引下，完善分配制度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措施^[1]。在具体的分配机制上，初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强调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再分配是政府基于公平原则，通过累进税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式对资源进行的重新配置；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社会主体自愿捐赠而进行的济困扶弱行为^[2]。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体现了从效率到公平再到社会责任的递进关系，它们共同构成实现共同富裕的复合途径。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形成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为核心议题的两个研究方向。其一，在初次分配中，高等教育被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驱动力。接受高等教育能显著提升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带来更具前景的就业机会与薪资水平等经济回报^[3]。然而，由于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能否上大学”的机会不平等也会反映在初次分配的结果中^[4]，导致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体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异。此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拓展高等教育服务的可及性，可以为低收入群体打开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门，改善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和收入增长潜力^[5]，进而形成更为良性的收入分配格局。其二，再分配作为“有为政府”积极纠正市场配置失灵的施政举措，其政策效果高度依赖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6]。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通过提升个体的生产力与收入能力，增强纳税者的税收贡献能力，有效扩大了国家税基。同时，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多种职能，不仅推动宏观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7]，也为完善现行税收和财政体制提供了智力支持，最终为税收体系的稳健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有别于市场机制主导的初次分配和行政机制主导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强调非物质因素如道德力量、精神力量、文化习俗和价值追求的影响^[8]。通过第三次分配，社会主体以慈善捐赠的形式将其收入、财富等资源转移给他人，不仅补充市场和政府机制的不足，还促进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的发展。所以，探讨高等教育获得是否能够有效增强民众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倾向，是评估高等教育在发挥收入调节功能有效性的关键。目前围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献还较少，尽管有研究分析了个体教育水平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忽略了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论各异。例如，部分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与慈善捐赠之间存在正向关联^[9]，但也有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与捐款可能性之间没有显著关系或存在着负向抑制效应^[10]。

高等教育获得是否对慈善捐赠行为具有促进作用？这个问题凸显了高等教育在促进资源公平流动中的关键作用，回答该问题也能够为理解高等教育如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视角。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通过准实验设计对高等教育获得与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高等教育获得对慈善捐赠行为的直接影响

随着“第三次分配”概念被正式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开始集中关注个人捐赠行为背后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驱动因素^[11]，以求构建更为合理、有效的捐赠激励机制。高等教育旨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包括专业技能培养与知识启发，还涉及道德品质与公共责任感的塑

造。从这两个维度来看,接受高等教育可以直接驱动个体的慈善捐赠行为。一方面,通过拓宽知识视野和提升专业技能,高等教育经历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问题复杂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进而激发其参与慈善捐赠的动机。同时,高等教育还通过培养学生的领导力与批判性思维^[12],提升他们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能力,使其能为社会福祉做出更有效的贡献。另一方面,在社会道德意识变迁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能否帮助学生形成良性道德观念,是评价其履行社会职能承诺的重要指标^[13]。高等教育机构通过价值观引导和道德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14],内化其道德动机,使他们更愿意参与慈善捐赠活动。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二)高等教育获得、收入水平与慈善捐赠行为

在资源约束的现实情境中,慈善捐赠作为个体支出的一种形式,其规模和频率受到捐赠者收入水平的显著影响^[15]。个体在做出慈善捐赠决策时,会充分评估自身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既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收入水平与其慈善捐赠参与倾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6]。这意味着,随着收入增长,个人参与慈善活动的意愿和频率会相应提高。此外,捐赠金额也会随着捐赠者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增加^[17]。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人收入水平的积极影响已被广泛研究。经典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层次越高,个体的生产力及其创造的经济价值越大,因此能够获得更高的薪资报酬^[18]。在人力资本研究的早期,明瑟(Mincer)着重探讨了学校教育对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其关于收入方程的研究证实了教育水平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确实能提高个人的经济收益^[19]。此外,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调查,在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教育仍然发挥减少劳动者失业风险的重要作用,而且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劳动者每周收入的中位数显著高于仅有高中学历的劳动者^[20]。这说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具有更强的经济稳定性和收入韧性,进而有助于减轻个体面临捐赠决策时可能存在的财务担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收入水平是高等教育获得促进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潜在机制。

(三)高等教育获得、数字能力与慈善捐赠行为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公益模式正经历着新一轮的颠覆和再塑,“互联网+慈善”成为公益事业的新兴增长领域。在此背景下,居民的数字能力对参与慈善捐赠的促进效应至关重要。一方面,具备较高水平的数字能力可以使个体更加熟练地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平台进行慈善信息的搜索与甄别^[21],帮助其了解慈善项目的捐赠方式和资金去向;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数字能力,个体不再受限于传统捐赠中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能够更便捷地参与网络捐赠活动^[22]。同时,数字能力的概念已经成为人力资本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扩展^[23]。正如非认知能力已被纳入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内涵一样,数字能力也逐渐被视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力资本。在此理论框架下,高等教育在提升个体数字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提供结构化教学环境,整合数字技术和教育课程,使学生能够系统性地获取必要的数字技能^[24]。此外,高校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数字资源访问权限,包括在线图书馆、数据库和学习平台等^[25],这些资源的可获取性极大地激励了学生参与并提升其数字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数字能力是高等教育获得促进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潜在机制。

(四)高等教育获得、社会信任与慈善捐赠行为

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信任扮演着多方面的关键角色,不仅对构建社会关系网络至关重要,也是促进合作与互惠行为的基石^[26]。其中,区别于指向熟悉人群的人际信任,社会信任涉及个体对社会中广泛群体特别是陌生人的基本信任。这种信任范畴能够简化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故而被视为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27]。基于此,只有当个体对社会持有较高等度的信任时,才更可能为社

会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相较于人力资本理论所关注的教育水平、技能等凝结在个体身上的资源,社会资本理论的焦点在于嵌入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如社会信任。鉴于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28],高等教育也被视为塑造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其社会信任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在高等教育阶段尤为显著^[29]。一般认为,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体社会信任程度的影响可以通过经济性和社会性两条路径实现^[30]。其中,经济性路径强调高等教育在改善个体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方面的作用,这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在面对失信行为时可能承受的损失较小,因此更容易对他人产生信任;社会性路径强调信任是通过社会互动逐渐习得的,高等教育经历有助于促进个体参与社会组织、提升社交能力和拓展人际关系,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信任感。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 社会信任是高等教育获得促进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潜在机制。

三、数据、变量与识别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微观数据库。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导的一项社会调查项目,调查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使得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在CFPS其他年份数据对居民个体基本特征、教育程度等信息的采集基础上,2018年问卷设计中增加了对于个人捐赠行为的调查,这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相契合。

根据需要,本文还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为限制时间窗口以增强样本之间的可比性,选取出生在校扩招干预临界点前后各10年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即保留出生在1971—1990年的样本;(2)将2018年个人数据库与2010—2016年个人数据库进行纵向匹配,以获得个体早期户口信息;(3)将2018年个人数据库与家庭关系数据库进行横向匹配,以获得父母相关信息;(4)由于研究需要使用个体的最高学历,所以删除调查时还在上学的少量样本。最终,本文共得到6452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体是否有过慈善捐赠行为,根据CFPS2018年调查中“过去12个月,请问您个人是否向任何组织或个人捐过款?”一题来衡量。若受访者回答“是”,则该变量赋值为1;若回答“否”,则赋值为0。

解释变量。高等教育获得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当个体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时将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CFPS提供了个体已完成的最高学历、离校/上学阶段以及教育年限等多种教育信息,为避免辍学、肄业或学制差异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这里使用个体已完成的最高学历来进行识别。

机制变量。本文的机制变量共有3个:收入水平、数字能力和社会信任。收入水平通过将个人过去12个月所有工作(主要工作+一般工作)总收入加1取对数来衡量。数字能力从数字学习能力、数字工作能力、数字社交能力和数字娱乐能力4个方面进行评估,并分别使用问卷中“使用互联网学习的频率”“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使用互联网娱乐的频率”4个问题来表征^[31]。根据使用频率由“几乎每天”到“从不”,4个取值依次为1到7分。本文将其反向计分后求和,以此构造数字能力变量,数值越大说明个体对数字能力的掌握程度越高。社会信任通过问卷中受访者对陌生人信任度的评分来衡量,评分取值范围为0-10,分值越高表示信任度越高。

控制变量。为避免不良控制,本文纳入一系列前定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性=0,女性=1)、民族(汉族=0,少数民族=1)、早期户口(12岁时非农户口=0,农业户口=1)、父亲学历(高中以下=0,高中及以上=1)与母亲学历(高中以下=0,高中及以上=1)。各变量的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慈善捐赠行为	6 452	0.290	0.454	0	1
解释变量	高等教育获得	6 452	0.168	0.374	0	1
	收入水平	6 452	5.608	5.208	0	14
机制变量	数字能力	6 452	10.232	8.203	0	24
	社会信任	6 452	2.315	2.165	0	10
	性别	6 452	0.507	0.500	0	1
	民族	6 452	0.096	0.295	0	1
控制变量	早期户口	6 452	0.874	0.332	0	1
	父亲学历	6 452	0.354	0.478	0	1
	母亲学历	6 452	0.204	0.403	0	1

(三) 识别策略

为研究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设定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Y_{ip} = \alpha_0 + \alpha_1 H_{ip} + \alpha_c C_{ip} + \delta_p + \varepsilon_{ip} \quad (1)$$

式(1)中,下标*i*代表个体,*p*代表个体所在省份。 Y_{ip} 表示被解释变量,即个体的慈善捐赠行为; H_{ip}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即个体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其系数 α_1 若显著为正,说明接受高等教育促进了慈善捐赠参与; C_{ip}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性别、民族、早期户口、父亲学历和母亲学历等; δ_p 表示个体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可以吸收与省份相关的所有不变特征; ε_{ip} 为误差项。考虑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后续回归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进行估计。

然而,否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典型的内生变量,若仅利用式(1)对高等教育获得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识别,无疑会面临遗漏变量等问题所致的估计偏误。例如,家庭和区域的文化氛围可能共同塑造了个体的教育追求与慈善行为。另外,非认知能力越高的个体往往会因情感共鸣或同理心而进行慈善捐赠,同时非认知能力也能够帮助个体在学业上取得更大成就^[32]。在回归模型中,此类文化或能力因素都难以观测和控制。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这一更为严谨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为本文工具变量的构造带来外生冲击。一方面,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大学录取人数迅速增加,当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由1998年的108万急剧增至160万,增长率高达48%,说明高校扩招政策与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另一方面,高校扩招政策具有明显的紧急性和突发性。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引致的内需不足及就业压力困境,1999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该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大幅增加。由于其突然性和重大影响,个体不太可能通过自身选择来影响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因此该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事实上,基于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所构造的工具变量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或教育代际流动研究^[33]。为此,本文基于强度倍差的思想,在工具变量构造中将高校扩招政策在个体出生队列和省份扩招强度两个层面上的冲击进行整合,以更好捕获个体受到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效应,具体公式如下:

$$E_{ip} = B_i \times U_p \quad (2)$$

其中, B_i 表示个体*i*的出生队列是否属于高校扩招政策的干预范围,若个体在1981年9月及以后出生,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U_p 表示个体所在省份*p*的扩招强度,使用1998年该省份普通高等学校

在校学生数来衡量^[34]。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中的分省定额规则以及高等教育资源存量的历史延续性,使用扩招之前的区域高教资源来构造政策强度变量具有合理性。另外,由于 CFPS 没有直接询问个体参加高考时的户籍所在地信息,本研究使用个体 12 岁时的户籍所在地作为替代。最终,二者的交互项 E_{ip} 即为工具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仅包含高等教育获得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列(2)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列(3)进一步纳入相关控制变量。由表 2 可见,高等教育获得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正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接受高等教育与慈善捐赠行为正相关。以列(3)为例,拥有高等教育学历会带来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提高 25.4%,假设 H1 初步成立。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慈善捐赠行为	
高等教育获得	0.262 ^{***} (0.019)	0.258 ^{***} (0.017)	0.254 ^{***} (0.016)
性别			-0.028 ^{**} (0.012)
民族			-0.033 (0.030)
早期户口			-0.022 (0.018)
父亲学历			-0.008 (0.012)
母亲学历			-0.020 (0.014)
省份固定效应		√	√
常数项	0.246 ^{***} (0.012)	0.247 ^{***} (0.003)	0.291 ^{***} (0.016)
观测值	6 452	6 452	6 452
R ²	0.047	0.062	0.064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在省份层面的标准误;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该回归结果受到模型设定和样本选择的干扰,本文从 3 个方面对其稳健性进行检验。第一,更换为非线性概率模型。经验研究显示,基于 OLS 的线性概率模型可以用于概率范围在 0.20 到 0.80 之间的模型^[35],而作为基础的离散选择模型,Logit 和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进一步验证其稳健性。第二,控制省份—出生队列联合固定效应。通过省份—出生队列联合固定效应,不仅吸收了省份固定效应与出生队列固定效应,也能够控制不同省份随出生队列变化的因素对结果的干扰。第

三,剔除北京、上海样本。考虑到北京和上海在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本文剔除了来自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样本并进行重新回归。上述限于篇幅未报告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三)因果推断:工具变量法

尽管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作用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但其中的内生性问题仍旧存在。为有效识别高等教育获得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使用式(2)所构造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无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结果均表明在通过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促进效应仍显著成立。

此外,对于不可识别检验,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 P 值均小于 0.01,说明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对于弱工具变量检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分别为 81.164 和 104.100,远大于 16.380 的 10% 临界值。总体而言,上述检验说明本文利用高校扩招政策在个体出生队列和省份扩招强度两个层面上的冲击来构造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表 3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1)	(2)	(3)	(4)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工具变量	0.012*** (0.001)		0.011*** (0.001)	
高等教育获得		0.285*** (0.076)		0.272*** (0.079)
控制变量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常数项	0.112*** (0.006)	0.049 (0.037)	0.387*** (0.027)	0.091* (0.051)
观测值	6 452	6 452	6 452	6 452
R^2	0.111	0.062	0.199	0.064
Kleibergen-Paap rk LM		11.486 [0.001]		12.200 [0.001]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81.164 {16.380}		104.100 {16.380}

注:[] 内为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 P 值;{ } 内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 水平下的临界值。

(四)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高等教育获得可以通过收入水平、数字能力与社会信任 3 条路径作用于慈善捐赠行为。为厘清该作用机制,本文做进一步的机制检验。鉴于传统的三段式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存在缺陷,这里参考牛志伟等的做法^[36],在三段式检验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增加使用 Bootstrap 推导的置信区间,以提高机制检验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列(1)、列(2)、列(3)分别展示了中介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在这 3 列中,高等教育获得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接受高等教育能够对个体的收入水平、数字能力与社会信任均产生促进效应。列(4)、列(5)、列(6)展示了被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收入水平、数字能力与社会信任均能显著增加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

率。最后,列(7)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对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中高等教育获得的系数显著为正,各个中介变量也继续显著正向影响个体的慈善捐赠行为,说明假设 H2、H3、H4 成立。本文进一步利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 1 000 次自举抽样,以获得中介效应基于百分位数表示的 95% 置信区间。其中,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的置信区间为[0.012,0.027],数字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的置信区间为[0.098,0.127],社会信任作为中介变量的置信区间为[0.003,0.015]。以上置信区间均未包含 0,再次验证了高等教育获得可以通过正向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数字能力与社会信任,进而促进个体参与慈善捐赠活动。

表 4 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收入水平	数字能力	社会信任		慈善捐赠行为		
高等教育获得	3.138*** (0.298)	9.083*** (0.407)	1.060*** (0.090)				0.128*** (0.014)
收入水平				0.010*** (0.002)			0.003** (0.001)
数字能力					0.015*** (0.001)		0.012*** (0.001)
社会信任						0.015*** (0.003)	0.006** (0.003)
控制变量	√	√	√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	√	√
常数项	6.992*** (0.295)	11.570*** (0.545)	2.509*** (0.089)	0.325*** (0.021)	0.171*** (0.021)	0.362*** (0.027)	0.115*** (0.021)
观测值	6 452	6 452	6 452	6 452	6 452	6 452	6 452
R ²	0.166	0.277	0.075	0.038	0.091	0.032	0.103

(五) 异质性分析

前述结果表明,接受高等教育在因果关系上显著促进了个体参与慈善捐赠活动。然而,这种影响效应可能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呈现明显的异质性。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性别和户口类型一直是教育研究领域的重点议题。一方面,子女的性别会深刻影响父母的教育态度、教育理念和家庭教育资源投入^[37],从而间接作用于子女的教育成就和未来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着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与教育资源分布情况,“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本身也直接构成教育机会不平等分配的社会现实^[38]。鉴于这些背景因素,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和户口差异。

本文根据个体性别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并构建高等教育获得与性别的交互项来判断组间系数差异的显著性,其结果如表 5 中列(1)、列(2)和列(3)所示。根据表 5 列(1)与列(2),高等教育获得对慈善捐赠行为的促进效应在女性和男性分样本中均显著成立。尽管男性样本中高等教育获得的回归系数值更大一些,但结合列(3)中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可知,影响效应的性别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高等教育获得作为促进慈善捐赠行为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力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较为均衡。

本文采用样本早期是否持有农业户口来界定其属于农村还是城市,并同样进行分组回归和交互

项回归。根据表 5 中列(4)和列(5)的回归结果,在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子样本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分别提高了 28.8 和 13.3 个百分点。同时,列(6)中高等教育获得与早期户口的交互项系数为 0.157,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等教育获得对慈善捐赠的促进效应确实是在拥有农村出身经历的样本中更为凸显。可能的解释是,尽管农村出身的个体在资源禀赋上较为匮乏,但他们在乡村熟人社会的成长环境中,能更深刻地体验彼此依赖和相互帮助的价值观,进而在他们的心中留下道德要素和人情规范的“烙印”。同时,对于农村出身的个体而言,他们可能更容易理解和共情贫困弱势群体,因此在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知识、技能以及经济资源后,会更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

表 5 基于性别和早期户口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女性	男性	全样本	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	全样本
高等教育获得	0.245*** (0.028)	0.261*** (0.019)	0.254*** (0.019)	0.288*** (0.018)	0.133*** (0.029)	0.136*** (0.035)
高等教育获得×性别			-0.002 (0.031)			
高等教育获得×早期户口						0.157*** (0.041)
控制变量	√	√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	√
常数项	0.292*** (0.031)	0.264*** (0.024)	0.291*** (0.016)	0.267*** (0.005)	0.324*** (0.031)	0.349*** (0.023)
观测值	3 270	3 182	6 452	5 639	813	6 452
R ²	0.070	0.066	0.064	0.065	0.072	0.067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采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体参与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平均提高了 20% 以上。在经过替换估计模型、控制联合固定效应、剔除部分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保持稳定。长期以来,学术界集中于探讨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而对其在社会福祉发展中的非经济效应关注不足。本研究通过分析高等教育获得与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联,为更全面地理解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提供了重要补充。

第二,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高等教育获得对慈善捐赠行为的积极影响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具体包括提升收入水平、强化数字能力和增强社会信任。首先,高等教育经历显著提升了个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他们进行慈善捐赠的经济可行性。其次,高等教育获得在强化数字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对数字化时代个体的慈善捐赠尤为重要。最后,高等教育获得通过增强社会信任,提高了个体参与慈善捐赠活动的意愿和动力。

第三,采用分组回归和交互项回归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获得对慈善捐赠行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性别和早期户口类型的样本中均成立。其中,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在女性与男性群体

间没有显著差异,这一发现侧面反映出高等教育的普及有助于打破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发展障碍,进而促使女性在慈善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另外,在拥有农村出身与成长经历的群体中,接受高等教育对慈善捐赠行为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这既归因于他们在成长环境中所形成的道德和人情规范,也可能源于他们对贫困弱势群体的深刻理解和共情。

(二)政策建议

第一,稳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容。一方面,本研究发​​现高等教育不仅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项目,具有极高的社会公益价值,这就需要进一步拓展高等教育服务的可及性。高等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而国际上普遍将80%以上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高教强国的标准。相比较而言,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仅能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加快人才红利的实现,同时也是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应当在扩大本专科招生规模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成人教育和终身学习,以促进全民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在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承载着经济驱动力的角色,其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同样关键。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不能仅仅依赖教育的数量堆叠,还需要通过内涵发展来确保高等教育服务的质量。这就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在纵向维度上增加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培养规模中的比重,在横向维度上拓展一流大学和学科的招生培养规模,在逐步解决高等教育供给充分性问题的过程中,推动高等教育服务从数量扩张向量质协调发展转变,从而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有价值的高等教育学习经历。

第二,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格局,完善高等教育阶段的资助政策体系。研究结果显示,高等教育获得对慈善捐赠的促进效应在女性与农业户口等弱势群体中同样显著,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均衡配置不仅有助于形成良性的初次分配格局,也可以通过受益群体的慈善捐赠活动来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基于此,政府首先应从宏观层面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可以通过构建由多部委和地方政府协同参与的经费支持体系,以及东部与中西部高校之间的对口支援合作平台,缓解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另一方面,在国家战略需求的引导下,积极推动地方高校根据当地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布局,着眼于内涵建设与特色发展,力求实现区域间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其次,在微观层面,完善针对弱势群体的大学生资助政策是确保这些群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和权利的重要保障。我国已初步建成“奖、助、补、贷、勤”一体多元的助学体系。然而,资助对象识别的不精准仍是影响资助效果的关键障碍。为此,需要建立一个贯通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的资助信息数据平台,以实现针对不同贫困类型的量化评估,从而使资助工作更加便捷、科学和规范。在确定资助对象后,高校应采取针对性的支持策略,将资助措施与教育活动进行综合规划,在帮助学生缓解经济压力的同时,激励其自我发展。

第三,鼓励高等学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强化道德教育与慈善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大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服务社会也是大学精神与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需要高校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重视其道德认知、慈善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养成。首先,高校应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下,设置更多关于道德、慈善以及公民责任的通识课程,并尝试融合德育教学和学科教学,推动德育多元化课程建设,进而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和公益慈善意识。其次,高校应将服务社会的理念深植于校园文化,重视发挥教师的道德表率作用以及朋辈群体的良性示范效应,鼓励师生参与或创建志愿者组织,并设立荣誉奖项表彰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学生和教职工。教师是高校教育教学的基石,高校还应致力于建设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优质教师队伍,共同开发并实施德育课程,编写校本教材,确保道德教育的实际成效。课外实践教学是深化学生道德认知的重要场域,高校可以与其他教育机构、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合作,共同

建立起多功能、多维度的育人平台,让学生有机会以志愿服务、情景模拟、角色体验、实地训练等形式深入参与各类公益活动,从而培养其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2021,56(11):413.
- [2] 王名,蓝煜昕,王玉宝,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2020(3):104-105,116.
- [3] SHAFIQ M N, TOUTKOUSIAN R K, VALERIO A. Who benefits from higher education in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9,55(11):2403-2423.
- [4] 何子晁,许建伟.高等教育回报:基于出生队列的工资效应[J].重庆高教研究,2023,11(6):103-115.
- [5] 李永友,柏霖.高等教育服务可及性扩展的增收与收入再分配效应:基于我国大学扩招的经验证据[J].教育研究,2023,44(4):122-136.
- [6] 曹晓婕,闵维方.教育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J].教育研究,2023,44(11):127-138.
- [7] 黄海刚,毋偲奇,曲越.高等教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路径与贡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5):2640.
- [8] 马文武,况成兰.第三次分配的科学内涵、理论逻辑与时代价值[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14(4):173-196.
- [9] 刘凤芹,卢玮静.社会经济地位对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13-120.
- [10] 马凌远,李晓敏.民营企业社会地位主观认知与个人慈善捐赠[J].统计研究,2021,38(1):105-118.
- [11] 刘铠豪,王雪芳.儒家文化、家庭社会捐赠与共同富裕[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2435.
- [12] DUNNE G. Beyond critical thinking to critical being: critic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lif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15,71:8699.
- [13] 鲍威,陈得春,佟琳楠.美德是否可教? 高等教育对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的影响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4):5671.
- [14] BRENNAN J, NAIDOO R.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and/or prevention) of equity and social justice [J]. Higher education,2008,56(3):287-302.
- [15] HUGHES P, LUKSETICH W. Income volatility and wealth: the effect on charitable giving[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08,37(2):264-280.
- [16] CHANG W C. Determinants of dona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iwan[J].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2005,43(2):217-234.
- [17] WENG Q, HE H. Geographic distance, income and charitable giving: evidence from China [J].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2019,64(5):1145-1169.
- [18] 闵维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现实意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18(1):926,188.
- [19] MINCER J.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Human Behavior & Social Institutions No. 2 [EB/OL]. [2024-12-10]. <https://www.nber.org/books-and-chapters/schooling-experience-and-earnings>.
- [20] EDWARDS R, ESSIEN L S, LEVINSTEIN M D. US labor market shows improvement in 2021, but the COVID-19 pandemic continues to weigh on the economy [EB/OL]. [2024-12-10]. <https://www.jstor.org/stable/48716862>.
- [21] 闫铭,孙迎联.刍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慈善信任的修复机制[J].社会保障研究,2023(1):66-76.
- [22] 李庆海,李实.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 128 786 户家庭的经验证据[J].改革,2023(7):126-144.
- [23] 吴梦涛,张龙天,武康平.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人力资本积累新模式探究[J].经济学报,2023,10(2):4-27.
- [24] BOND M, MAR? N V I, DOLCH C,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and teacher perceptions and usage of digital med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2018,15(1):4-20.
- [25] 郭婧,琪珥.德国大学数字治理:演进、经验与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23,50(5):106-115.
- [26] CAIS J, TORRENTE D, BOLANCE C.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crisis on trust: paradoxes for social capital theory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20,153(1):4-20.
- [27] 刁益虎.学生信任何以可能: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J].教育学报,2022,18(4):114-125.
- [28] 吴克明,孙百才.论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作用及其教育启示[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5-75.

- [29] 黄健, 邓燕华. 高等教育与社会信任: 基于中英调查数据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1): 98111, 205206.
- [30] 李东雨, 胡安宁. 教育如何让我们更信任他人: 基于 201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社会学评论, 2021, 9(6): 137155.
- [31] 姜扬, 郑怀宇. 数字技能与居民幸福感: 基于 CFPS 2018 数据的研究[J]. 人口学刊, 2023, 45(4): 5769.
- [32] 梁文艳, 周晔馨. 为何巾帼胜须眉? 非认知能力与大学生在校表现的性别差距[J]. 经济学报, 2023, 10(1): 344374.
- [33] GUO Y, SONG Y, CHEN Q. Impacts of education policies on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mobility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9, 55: 124142.
- [34] 沈煜, 孙文凯, 谷宇晴. 高校扩招、过度教育与职业陷阱[J]. 财贸经济, 2023, 44(4): 157172.
- [35] 邓红亮. 财政补贴与中低技能劳动者权益: 就业模式转变视角[J]. 世界经济, 2023, 46(11): 180212.
- [36] 牛志伟, 许晨曦, 武瑛.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J]. 管理世界, 2023, 39(2): 83100.
- [37] 孙俊华, 万洋. 规模扩张下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测度: 兼论高校扩招的教育代际流动效应[J]. 教育与经济, 2023, 39(3): 5363.
- [38]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 社会学研究, 2010, 25(3): 82113, 244.

(责任编辑: 杨慷慨 校对: 张海生)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on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WAN Yang, LI Fenglia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topic of optimizing income distribution through charitable endeavor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issues in China. As the cornerstone of social progress, higher education not only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but also plays a key role in cultivating citizen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Utilizing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and employing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provided by the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the study identified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on individuals'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s, and analyzed the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involve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individuals participating in charitable donation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mitigate endogeneity problems. Secondly,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on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s are demonstrated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income level, digital capabilities, and social trust. An individual's income level provide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donations, digital capabilities expand the channels of don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d social trust enhances their willingness to donate. These mechanisms collectively lead to a higher degree of activity and contribution in the charity sector among highly educated groups. Thirdly,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on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s is significant across sub-sample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early household registrations,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groups but more pronounced among those with rural backgrounds and upbringing.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cale and the capacity of 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in coordination, optimize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 and funding policy system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strengthen the rol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charitable education in talent training, to fully leverage the empowering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s; common prosperity;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